

东盟职教研究简报

2023年第3期（总第20期）

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编制

2023年5月

中心动态

- 国际教育学院教师参加中外合作办学专题研修工作坊……2
- 我院教师到天津市参加“鲁班工坊”联盟第二次成员大会……2

东盟资讯

- 中企与马来西亚知名拉曼大学开展校企合作……4
- 老挝学生乘高铁看中国：“比想象的要近、要多彩”……5
- 缅甸克钦邦基础教育学校发展现状……7
- 第29次中国—东盟高官磋商在深圳举行……9
- 柬埔寨中国教育交流协会“留学中国中心”举行合作签约仪式 助力柬学子赴华留学……10

国别研究

- 泰缅边境地区的克伦语教育……13
- 新时代中国对柬埔寨教育的援助：措施、作用与推进策略……17

热点分析

- “一带一路”十年，在东南亚面临哪些机遇？……28

◎中心动态

国际教育学院教师参加中外合作办学专题研修工作坊

5月8日至5月12日，国际教育学院教务科副科长李东明在江苏无锡参加了“2023年中外合作办学专题研修工作坊”。此次研修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研修学院主办，来自全国本专科院校60余位领导、教师参加研修。

本次研修以中外合作办学为主题，由全国本专科院校的10位资深专家授课，内容包含中外合作办学现状、中外合作办学申报、组织管理与质量保障、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案例分享等。专家们从国家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入手，结合自己的研究和管理经验，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中外合作办学实践操作和典型案例，将理论和实践融合一体。研修期间，主办方还组织学员实地参观了江南大学、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习中外合作办学实践经验。

本次研修学习深化了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认识，启发了我院申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新思路，为我院接下来启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实施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来源：铜仁职院国际教育学院）

我院教师到天津市参加“鲁班工坊”联盟第二次成员大会

5月10至12日，我院教师到天津市参加“鲁班工坊”联盟第二次成员大会。本次大会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鲁班工坊建设联盟主办，天津职业大学承办，300余位联盟成员代表出席，是鲁班工坊建设联盟扩容后的首次成员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联盟工作总结和计

划；深入解读了鲁班工坊建设规程、项目运行方式和评价标准，介绍了鲁班工坊办学模式、推进措施和已取得的成效；组织了鲁班工坊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平行论坛，分享了鲁班工坊及境外办学项目建设经验、路径、特色，探讨了制度建设、可持续发展、挑战与应对等；安排与会人员参访天津市鲁班工坊建设体验馆。（来源：铜仁职院国际教育学院）

◎东盟资讯

中企与马来西亚知名拉曼大学开展校企合作

中建筑港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携手中建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于26日在拉曼大学金宝校区联合举办校企合作签约仪式暨中外青年对话会。

本次活动以“校企合作谋发展，携手共赢谱新篇”为主题。会上，中建筑港马来西亚公司与拉曼大学留服中心主任陶然代表校企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公司在拉曼大学建立“校企合作基地”，拉曼大学在公司建立“人才实习就业基地”。现场还开展了中外青年对话，校企双方青年代表共同畅想城市未来。

拉曼大学校长尤芳达出席活动时表示，拉曼大学未来将与中建筑港在人才联合培养、产学研结合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达到共赢的目标。

中建筑港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召财介绍，此次签约后，公司将与拉曼大学就优秀毕业生实习及自有职工属地化培训开展深度合作，并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在建筑领域最新的建筑理念、工艺装备、企业经营管理方式与拉曼大学专家教授合作研究，共同推动建筑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据介绍，此次签署合作协议后，校企双方将共同为社会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中建筑港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也在与拉曼大学开展港口建筑专业等领域合作，推进属地化建设上迈出重要一步。

拉曼大学留学服务中心主任陶然、中建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祝琰崑、来自中建八局海外公司和中建筑港的海外员工代表以及40多名拉曼大学师生也出席本次活动。（来源：中新网）

老挝学生乘高铁看中国：“比想象的要近、要多彩”

5月25日13时38分，乘坐着C308次列车，宋颂芭和同学们抵达此次中国行的第二站——昆明站。“这里的车站更大了，但有着同样的中国朋友等着我们。”这是宋颂芭下了高铁，看到的景象。



10岁的宋颂芭和99位同样来自老挝的小朋友们，正在体验乘着高铁看中国的旅行。23日早上，他们还在老挝首都万象吃早餐，当日下午就抵达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在体验当地小学课堂、和中国小朋友联谊后，他们又于25日踏上向北的旅行。

这是宋颂芭第一次来中国，也是她第一次坐火车。原本家人还担心她会不适，但她却很享受一边看着车窗外的风景一边画画。“沿路有很多好看的建筑，风景也很美丽。飞驰而过的高铁就像一根线，串起了一座座如珍珠般的城市。”宋颂芭把她看到的“发展的中国”，画在纸上。

在没有到达中国前，10岁的比撒对中国的了解仅仅只是一些零星的单词：北京、长城、功夫……“感觉很遥远”。乘坐火车来到中国后，他发现中国远比想象的“要近，要大，要多彩”。



比撒注意到，和他们联谊的允景洪小学乐团里，有吹葫芦丝的，有吹笛子的，有拉小提琴的，也有弹古筝的……“我很喜欢这种多样的感觉。”比撒说。

和宋颂芭看到“发展的中国”、比撒注意到“多彩的中国”不同，来自老挝万象的提答婉感受到一个“可亲可爱的中国”。“西双版纳傣族女孩头上戴着和我一样的占芭花，这是我们老挝的国花。”提答婉很开心，西双版纳的街头盛放着和家乡一样的鲜花；云南小朋友和她一样喜爱大象；不管火车开到哪里，都有同样的笑脸。

尽管对中国的了解尚浅，但提答婉和同学们都很乐于走进中国、认识中国，感兴趣的点也各不相同：有人好奇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牡丹花，有人想知道凤冠霞帔的历史，有人想探秘中国航天科技，有

人想学习开火车，也有人想知道中国发展的密码。但大家也有个共同的愿望——结交一个中国朋友。



“我们永远做朋友。”在准备送给中国朋友的画作中，不少老挝学生用老、中双语写下这句话。随行的老挝老师宋雅说：“要有中国朋友，是老挝小朋友们朴素的愿望。”

当日下午抵达昆明后，百名老挝学生还和昆明中华小学的学生们同做云南鲜花饼，共绘眼中的美丽世界。接下来，他们还将乘坐高铁前往北京、西安、厦门、广州等地进行交流。（来源：中新网）

缅甸克钦邦基础教育学校发展现状

据5月26日出版的《苗瓦底》日报报导，2023—24学年度基础教育学校将在6月1日就要正式开课进入新学年的学习了，而学生们的报名注册日期就定在5月23日至31日这一周内了。

克钦邦首府密支那(Myitkyina)县区内有国立高中学校23所，高

中分校 8 所；国立初中学校 16 所，初中分校 13 所；国立超级小学 32 所，国立小学 72 所及小学分校 1 所；故共有基础学校 165 所。5 月 23 日开始小学的报名注册工作，5 月 25 日接着接受初中及高中学生的报名工作。



2022—23 学年度时，克钦邦全邦内共有基础小学学生 189,085 人，初中学校学生 77,308 人，高中学校学生人数 23,464 人等注册报名，之后来上学的人数达到 96%。

克钦邦首府密支那县区基础学校总数：

序	学校种类	学校数目	2022—23 学年度克钦邦基础学校学生报名人数		
1.	国立高中	23 所	序	各类学校	学生人数
2.	高中分校	8 所	1.	小学学生人数	189,085 人
3.	国立初中	16 所	2.	初中学生人数	77,308 人
4.	初中分校	13 所	3.	高中学生人数	23,464 人
5.	超级小学	32 所			289,857 人
6.	国立小学	72 所			
7.	小学分校	1 所			
	共	165 所			

克钦邦作为缅甸第二民族大邦，基础教育也有一定的规模。首府

密支那县区内除了国家政府开设的国立高中、国立初中等之外，当地民众也自发地开办了不少高中分校、初中分校等学校，就足以说明当地民间重视教育的程度。而国立超级小学的建立，是该国立学校原本只是办到小学(当时只是到四年级)而已，但民众们热情办学，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弟在小学毕业后就要跑到远地去上初中，就在原来小学基础上多办几个班级，五年级、六年级甚至七年级，这样的学校就称为“超级小学”了。（来源：缅华网）

第 29 次中国—东盟高官磋商在深圳举行

2023 年 5 月 25 日，第 29 次中国—东盟高官磋商在广东深圳举行。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农融和缅甸外交部常秘千埃共同主持，东盟其他各国高官或高官代表和东盟秘书处代表出席会议，东帝汶以东盟观察员身份与会。

农融强调，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0 周年，也是中方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 周年。当前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同东盟国家秉持互利共赢精神，携手共建中国东盟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和友好“五大家园”，在新兴产业、新能源、货币金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人文交流等领域挖掘新的发展合作机遇。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同东盟共同体建设协同增效，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东盟国家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期待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新机遇，表示愿同中方一道，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

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互联互通、可持续农业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挖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东盟合作潜力。加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对话合作，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来源：新华社）

柬埔寨中国教育交流协会“留学中国中心”举行合作签约仪式 助力柬学子赴华留学

5月25日，柬埔寨中国教育交流协会“留学中国中心”合作签约仪式在柬埔寨监察部礼堂举行。

留学中国中心是柬埔寨中国教育交流协会为响应中国教育部“留学中国”计划，为柬埔寨学生赴华留学提供一站式留学服务。

据悉，中国教育部自2010年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施“留学中国”计划，建立并完善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全面提升来华留学质量。推进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建设，拓展人文交流领域，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

柬埔寨留学中国中心联合中国大学，为柬埔寨学生提供一站式服务内容，包括：免费中国大学入学咨询服务、免费入学申请服务，组织学生参加HSK汉语水平考试服务，并为优秀学生申请留学中国奖学金，以及线上线下中文课程培训等。

签约仪式中，柬埔寨留学中国中心分别与柬埔寨监察部、柬华理事总会、柬埔寨中国港澳侨商总会签署留学中国奖学金合作备忘录，

留学中国中心将每年为合作机构提供固定名额的奖学金。留学中国中心计划在三年内帮助 2000 名柬埔寨学生到中国大学留学。

同时，为让柬埔寨学生更加了解中国大学，由柬埔寨教育交流协会举办的第一届“留学中国”教育展将于 2023 年 11 月 3 日-11 月 5 日在首都金边钻石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据柬埔寨中国教育交流协会执行会长高健先生介绍，留学中国教育展届时将邀请 100 所中国大学参展，让柬埔寨学生深入了解中国大学的课程情况和学校风采。第一届“留学中国”教育展已获得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和新闻部的认可和支持。留学中国教育展，不仅为柬埔寨学生前往中国留学提供最好的机会和选择，同时为中柬两国的大学和教育机构、国际教育交流工作者、院校领导、专家学者、各级各类机构及企业界代表，搭建面对面交流合作的机会。

柬埔寨监察部办公室主任 H. E Hong Long、柬埔寨中国教育交流协会顾问 Oknha Sok Rado、柬华理事总会副会长蔡伟华勋爵、柬埔寨中国商会轮值会长赵金辉、柬埔寨中国港澳侨商总会常务副会长兼副秘书长黎松、中国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研高等教育培训中心理事长马巍分别在大会上致辞，致辞嘉宾对加速推动柬埔寨学生前往中国留学，加强柬中青年学生的交往和文化交流，予以了充分肯定并提出殷切希望。

受邀出席活动的嘉宾还有柬埔寨监察部办公室副主任 H. E Tong Vannak、柬埔寨洪森亲王及夫人奖学金协会在华留学生管理工作组副组长郑贤利勋爵、柬埔寨前副总理杨来生夫人汪莉华女士、柬华理事

总会秘书长钟耀辉、柬埔寨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常务秘书潘干武，以及以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研高等教育培训中心理事长马巍带领的中国教育投资考察团。（来源：东盟头条）

◎ 国别研究

泰缅边境地区的克伦语教育

海索·达戈 (HaysoThako)、托尼·沃特斯 (Tony Waters)

(太印指针 观察员)

泰缅边境地区的克伦语教育仍然盛行。目前，有 13 万多名儿童在缅甸克伦民族联盟 (KNU) 和泰国克伦难民委员会 (KRC) 开办的克伦学校接受教育。这些学校正在利用以母语为基础的识字原则，这些原则重视识字从母语开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至少有 100 万人完成了以克伦语识字为重点的基本克伦语课程，其中许多人继续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在这些教育中，课程以克伦语和英语授课。

尽管自 1962 年奈温 (Ne Win) 政变以来，缅甸的克伦语学校被边缘化，但克伦语教育仍在继续。当时，三角洲地区的克伦语学校被缅甸教育部的缅语学校取代。从那时起，在政府控制之外的边境地区，克伦语的教育体系一直很强大。事实上，在 2021 年公民抗命运动 (CDM) 兴起后，许多政府资助的学校被关闭，克伦语教学甚至可能得到加强。

克伦语教育之所以强大，部分原因是它进入了泰国，在那里，难民营和移民学校的教学都在继续。泰国的克伦语教学通常由克伦难民委员会组织，该委员会还为缅甸境内仍由克伦民族联盟运营的学校提供支持。两地的克伦语学校反映了从 19 世纪开始的克伦语学校继承下来的克伦语教育传统。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使用了改编自西方的教学技术和教学法，将学生培养成克伦民主的“批判性思想家”。



(克伦族儿童在泰缅边境学习-克伦难民委员会)

一、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的发展

克伦语教育实际上始于 19 世纪 40 年代，印刷机的建立以及学校教育的出现，当时克伦人的识字能力得到了发展。最早的努力是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Irrawaddy River Delta）和仰光（Rangoon，现 Yangon）。这导致了克伦学校系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迅速扩张。克伦语和英语教学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勃生（Bassein，现 Patheingyi，伊洛瓦底省首府）和仰光的大型基督教传教区蓬勃发展。

1852 年，美国浸信会（American Baptist）传教士在勃生开设了克伦人的浸信会教会小学。1854 年在戈绥（Koesue）开办了一所克伦语中学。克伦浸信会神学院（Kare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于 1845 年在仰光成立，旨在培训懂克伦语和英语的牧师。

勃生斯高克伦师范与工业学院（BasseinSgaw Karen Normal and Industrial Institute）教授英语、圣经、数学、地理、历史和健康，以及木工、细木工、车轮制造和水稻生产等 19 世纪的职业科目。没有迹象表明缅语是克伦语学校的一种语言，只是作为一门学科。

1962 年后，当奈温政府将克伦语学校国有化，并坚持“缅化”课程，重视缅语、历史和民族主义时，克伦语学校开始衰落。在克伦语师范学院（Karen Teacher Colleges）接受培训的克伦语教师被在政府学院接受训练的讲缅语的教师取代。以母语为基础的克伦语教学进入山区，克伦民族联盟在那里重新建立了独立学校。1984 年后，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和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的支持下，克伦语学校也进入了泰国的难民营。

二、独立的克伦语学校体系出现

克伦民族联盟通过建立自己的学校来抵制缅化。他们建立的教育体系在困难的环境下制定、维护和再现了克伦语言和文化。以这种方式，尽管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和首都仰光的克伦语教育有所下降，但克伦语教育仍然存在。

这并没有阻止缅甸军方试图将控制权扩大到山区。1995 年至 1996 年，位于马拉布洛（Manerplaw）的克伦民族联盟首都被攻占。克伦教育部（KED）继续在缅甸境内运营学校，尽管总部位于泰国湄索（Mae Sot）的克伦难民委员会教育实体（KRC-EE）变得更加重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加强了克伦语的教育体系，因为它使学校体系与对教育改革很关注的国际组织建立了联系。克伦难民委员会教育实体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成立，克伦难民委员会教育实体就重新评估了如何有效地使用现代教学方法。年轻的克伦族教师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学习了这些技术，然后返回难民营和湄索实施项目。这些项目很成功，很快，难民学校不仅接收了来自缅甸克伦民族联盟控制地区的克伦族学生，还接收了来自仰光、伊洛

瓦底省和德林达依省的想学习克伦语和英语媒体课程的少数民族学生。

三、目前边境地区的克伦语教育

克伦难民委员会的教育实体通过改编旧的克伦民族联盟克伦教育部课程来开发克伦语课程，反过来，该课程又基于 19 世纪缅甸开发的克伦语课程。小学和中学课程持续 12 年。值得注意的是，这比缅甸持续 10 年的体制要长。在重视世俗教师培训和教会领袖发展的高等教育培训体系中引入了重视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技术。难民营学校在发展克伦语教育方面有一个简单的优势，因为它们不像缅甸的学校那样受到缅甸军方的袭击。

四、难民学校课程

自 2008 年以来，难民营的教育体系已经标准化，制定了新的课程，并得到了克伦语教育利益攸关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克伦难民委员会教育实体课程采用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取代了缅甸传统上使用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克伦语是学校的教学语言，英语是从小学开始教授的。根据以母语为基础的教育原则，缅语是作为一门学科教授的，但不是作为一种教学语言。一些学校偶尔也会选修泰语。克伦族领导人鼓励难民营中的学生学习缅语，但毫不奇怪，大多数年轻的难民学生拒绝学习缅语，因为缅语被视为统治的工具。

2015 年，克伦教育部发布了一项教育政策，其中包含以下四项基本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它没有提及国家边界，但反映了世界各地许多民族和国家课程中的价值观。

*每个克伦人都应该学习自己的文字和语言。

*每个克伦人都应该熟悉克伦族的历史。

*发扬克伦族的文化、习俗和传统。

*我们的克伦族文化、风俗习惯和传统应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风俗和传统应相互承认和尊重。在各个阶段，都教授克伦族历史、文化、诗歌和世界历史。

五、敏感话题

从缅甸人的角度来看，克伦语历史可能是最敏感的科目。克伦人的历史描述了在英国人到来之前，缅族文化及其国王是如何统治和奴役克伦人的。克伦历史书将 19 世纪英国人的到来描述为从缅甸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使得土著克伦文化得以重现。

相比之下，最初奈温的教育部创造的缅甸历史表明，克伦人是叛乱分子，是对国家统一的威胁，特别是在 1962 年后坚持的高度集中的政府结构的背景下。缅甸历史教科书将英国称为试图摧毁国家的外部敌人，并将英国描述为帝国主义者、通敌者和“傀儡”。克伦语历史教科书讲述了英国议会制度的积极遗产，以及传教士最初以美国教育制度建立的克伦教育制度。除了克伦语是小学的教学语言之外，还有其他的对比。克伦语课程中的几个例子。

1、克伦语诗歌 (Hta) ——克伦语诗歌是从 6-8 年级开始学习的克伦语科目。从克伦的文学风格出发，研究了克伦诗歌散文的写作风格。从 8 年级开始，对克伦诗歌的变体及其解释进行复习。在克伦语科目的 9 年级和 10 年级，研究了克伦语的不同分类及其历史。

2、昂山 (Aung San) ——昂山将军在克伦历史课程中没有被特别提及，只在缅甸革命运动的简史中被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昂山将军指挥的缅甸独立军 (BIA) 与克伦人之间的冲突在 7 年级的《历史》课中有描述，包括日本和缅甸独立军联合部队对克伦人的屠杀。

3、苏巴吴基 (Saw Ba U Gyi) ——苏巴吴基作为民族英雄和克伦民族之父，在克伦语学校 6 年级和 10 年级学习。6 年级的缅语和克伦语科目也学习了苏巴吴基的传记。10 年级和 11 年级的《克伦历史》中学习了苏巴吴基自己写的作品。由于苏巴吴基的作品最初是用英语写的，所以关于他的内容在 10 年级和 11 年级课程中都是用英语教的。

4、宗教多样性——这是在 6、7、9 和 10 年级《社会研究》中学习的。在 6、7 和 9 年级，它是用克伦语学习的，10 年级是用英语学习的。研究了宗教的重要性和缅甸的宗教多样性，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

随着难民在难民营和流落他乡长大，包括许多对缅甸没有个人记忆的人在内，跨越国际边界的克伦族人“从根本上”形成了一种共同意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出生在临时难民营的难民儿童认为散居国外的克伦族和高都雷 (Kawtholei) 是他们的国家，即使这样的地方在国际地图上并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克伦语蓬勃发展。流行的克伦语电影和音乐制作场景为克伦族青年提供服务，在优兔 (YouTube) 和其他社交媒体上拥有大量观众。

当然，克伦语教育在山区的持续存在给未来寻求和平的缅甸政府制造了一个难题。很久以前，克伦语、缅语和泰语课程的分歧在泰缅边境地区的克伦族中产生了社会科学家所说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是关于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的认同，并假定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和政治自主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关于联邦制的谈判假设了这种自治，但谈判当然没有成功。因此，在克伦语学校接受教育的 13 万多名儿童及其家庭，与缅甸缅族人主导的军政府 (military government) 对一个受军方控制的纪律严明国家的要求之间仍然存在紧张关系。

教育体系	教师人数	学生人数	学校数量	科目	年级	附属组织
克伦教育与文化部-克伦邦/高都雷	7,946	10,931	1,233	克伦语、英语、缅语、历史、地理、数学、科学	从 1 年级到 12 年级	克伦民族联盟
克伦难民委员会教育实体	1,515	26,775	160	克伦语、英语、缅语、地理、社会科学、数学、科学	克伦难民委员会教育实体-泰国从幼儿园到 12 年级以及学院	克伦难民委员会

表 1-2022 年缅甸和泰国的克伦语中等学校

(资料来源：克伦教育与文化部 2022；克伦难民委员会教育实体 2022)

(本文来源：太印指针)

新时代中国对柬埔寨教育的援助：措施、作用与推进策略

曾云，吴坚

(曾云，赣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吴坚，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比较教育)

摘要：教育援助是新时代中国对柬埔寨发展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抓手之一。经过数年发展，中国对柬埔寨教育援助已形成包括改善教育基础设施、推动中文教育质量提升、帮扶职业教育发展、扩大来华奖学金留学生规模和开展人力资源培训在内的多元援助措施体系；并产生了互利共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通过提升人力资源质量、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减缓贫困问题，有力助推了柬埔寨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另一方面又有助于提升柬埔寨民众对华认同、推动华文教育在柬埔寨的发展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新时代中国对柬埔寨教育援助应着力通过完善顶层设计、转变援助模式、扩大援助范围以及填补发展“洼地”等推进策略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加强中柬互利合作，推动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新时代；柬埔寨；教育援助；命运共同体；华文教育；中华语言文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面对“世界向何处去”与“人类向何处去”时代之间的深刻回答，而对外援助则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产业扶持、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作为优先援助事项，切实帮助受援国改善民生和增强自主发展能力，迅速成为新兴援助国中的领军者。

柬埔寨属于欠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严重依赖国际援助。中国从 1999 年开始成为柬埔寨最大援助国，教育援助在其中的重要地位不断凸显，如 2010—2014 年间的援助项目就达到 13 个，在所有援助领域中位居前列^[1]。进入新时代，中柬两国以政府互动强化政策沟通，进一步加强互利合作，达成了更多共识。在此背景下，中国对柬埔寨教育援助的规模和质量也得到显著提升，成为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抓手之一。本文聚焦新时代中国对柬教育援助问题，试图探讨和回答三个相关核心问题：一是教育援助的具体措施

有哪些，二是教育援助对两国产生了什么积极作用，三是如何进一步推进和发展教育援助。

一、新时代中国对柬埔寨教育援助的具体措施

(一)改善教育基础设施

柬埔寨教育投入长期不足，例如 2018 年的公共教育支出仅占柬埔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2%，政府支出的 8.8%^[2]。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发展滞后，学校数量不足、校舍年久失修、教材严重短缺以及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手段缺乏等问题突出。为此，中国不断加大“硬援助”力度，切实帮助柬埔寨改善教育教学条件。首先，中国政府作为对柬教育援助的核心力量，实施了一批以校舍建设为主的示范性援助项目，包括 2014 年的桔井综合大学援建项目、2017 年的暹粒省荔枝山“国父国母”学校新校舍建设工程和 2019 年的援柬教育环境与设施改善项目。其次，中国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对柬援助，如江苏省于 2016 年底捐建江苏—西哈努克默德朗友好学校、2018 年云南省为柬埔寨警察学院捐赠一批装备物资并牵头开展了“2018 年柬埔寨贫困儿童教育援助项目”。最后，在柬中资机构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多措并举助力当地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如由中国企业开发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在引进援助项目——中柬友谊理工学院落户园区之后，还在 2019 年与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成立了西哈努克港工商学院，为当地员工提供必要的学历教育服务，开创了中国优秀民营企业与职业院校携手“走出去”建设股份制大学的先河。

(二)推动中文教育质量提升

从办学主体来看，柬埔寨的中文教育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由当地华校兴办的传统华文教育，另一类是由中国主导的国际中文教育，二者属于同一事业的不同形态。中国分别采取多种援助方式，共同推动柬埔寨中文教育向前发展。

柬埔寨华人社团以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为己任，始终致力于华文教育的维持与发展，目前拥有各类华校 55 所，学生规模超过 3 万人，成为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的翘楚。然而，办学资金紧张、华文师资不足等问题成为柬埔寨华校发展的主要痛点。对此，中国以各级侨务办公室为核心，通过捐赠、派遣中文教师志愿者以及组织来华师资培训等方式，满足柬埔寨华文教育发展的迫切需求。其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驻柬使馆分别捐资设立华文教育基金，并大量捐赠华文图书和学习资料^[3]；其二，每年按需求选派赴柬中文教师志愿者；其三，各级侨务办公室和地方高校组织开展面向柬埔寨等国的华文师资来华培训。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仅 2018 年就举办了“海外优秀华文教师班”“华文教育示范学校校长班”“华文教师证书班”和“热心海外华教人士班”等培训班。广东省侨务办公室连续数年举办“东南亚华文幼师培训班”，柬埔寨学员回国后多数成为当地华文幼教的骨干力量。中国地方高校

也充分发挥人才培养优势参与柬埔寨华文师资培训，如广西民族大学被教育部确定为“东盟国家中文人才培训中心”和“海外中文教师来华培训资助项目”承办单位，为柬埔寨各级华校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华文教师。

对柬国际中文教育以设立孔子学院、选派中文教师志愿者、开展联合培养等方式予以实施和推进。第一，中国已在柬埔寨设立了3所孔子学院。首家成立于2009年的皇家科学院孔子学院(下辖3个孔子课堂)已发展成为柬埔寨中文教育第一品牌，集中文教学中心、本土中文师资培训中心、中文考试中心和中国文化体验中心于一体^[4]；由广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承办的国立马德望大学孔子学院于2019年12月揭牌运行；2021年7月柬华理工大学职业技能教育孔子学院成立，代表了“中文+职业技能”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发展新方向。在柬孔子学院发展态势良好，在中文教育教学和文化交流互鉴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第二，中国每年选拔大量中文教师志愿者派驻柬埔寨各地中文教学点，仅2018年就达到241人，规模同比实现稳步增长。第三，为顺应联合培养高端本土中文教师的发展趋势，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与柬埔寨皇家科学院于2020年10月共同启动“1+1”柬埔寨本土中文师范专业(硕士)项目，培养工作先后在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进行^[5]。

(三) 帮扶职业教育发展

对柬职业教育发展的帮扶，采取中国各级政府委托国内职业院校承办援助项目这一基本模式，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重视与在柬中资企业、柬埔寨政府职能部门和当地职业院校的协同合作，并突出“中文+职业技能”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方向。在2016年“丝绸之路”教育援助计划推出之后，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援助项目(见表1)，为构建诚信互利的中柬职业教育命运共同体点燃了发展新引擎。以柬埔寨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亚龙丝路学院为例，它是中国在柬建立的第一所伴随企业“走出去”的海外丝路学院，开创了“海外+本土”双校区、“职业培训+学历教育”双形式、“中文+电气自动化”双课程的办学模式，仅2018—2019学年就招收电气自动化专业全日制专科学历学生80名，成为践行产教融合、校企共建共治共享共赢发展理念的生动案例^[6]。

表1 2016年以来中国对柬埔寨职业教育援助的代表性项目

序号	起始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主体	项目特色
1	2016年8月	南洋红豆学院(柬埔寨)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红豆集团公司	集学历教育、职业培训、语言培训和文化交流“四位一体”的综合性学院

2	2017年4月	浙经院—柬创院国际教育中心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柬埔寨王国柬印创业发展学院	中国在柬埔寨建立的首个职教中心，承担中国语言文化教学(短期面授+长期线上)和电子商务专业国际培训等工作
3	2017年9月	桂电—柬埔寨职业教育培训中心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柬埔寨劳工与职业培训部	培训基地分设中柬两地，提供电子信息技术专业技能培训 and 实习机会，学员通过考核后，由柬劳工与职业培训部和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联合颁发职业资格证书，中柬双方共同认可
4	2018年10月	柬埔寨“鲁班工坊”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柬埔寨理工学院	集职业培训、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创业等功能于一体
5	2018年12月	柬埔寨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亚龙丝路学院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温州亚龙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柬埔寨国家技术培训学校	浙江省在柬埔寨设立的首个海外分校，依托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开设“中文+电气自动化”等复合型专业

2018年1月，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提出，加强职业教育培训，支持在中国设立澜湄职业教育基地，在湄公河国家设立澜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这为加强中国对柬职业教育援助提供了政策支撑。2022年7月，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七次外长会议明确了“密切人文交往”等六大合作方向，审议通过《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宣布中国将实施“澜湄英才计划”等六大惠湄举措，同意加强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探索职业教育和技能发展新渠道、新模式，提高各国技术人才培养能力，为中国扩大对柬职业教育援助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和发展动力。

(四) 扩大来华奖学金留学生规模

新时代中国迅速发展成为柬埔寨主要留学目的国之一，来华留学生数量从2012年的1336人增加至2019年的2000余人。留学生规模的持续扩大既是中国教育比较优势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奖学金项目杠杆作用的积极显现。以中国各级政府、院校、企业为多元主体的多样化来华留学奖学金资助体系，也已成为推动对柬教育援助发展新的发力点。丰富多元的奖学金项目体现出中国对构建“中柬教育共同体”的使命担当和积极贡献。首先，中国政府奖学金在整个奖学金资助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近年来通过不断扩大资助覆盖面和提高资助标准，吸引柬埔寨优秀青年来华学习实用知识和技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在原有中国—东盟奖学金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专项基金”和“‘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柬埔寨来华留学生奖学金规模逐年扩大。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时宣布未来5年向柬方增加500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留学生重点学习农业技术、土木工程、经济学及医学等热门实用专业^[7]。据报道，

从 2022 年起 5 年内中国还将再提供 550 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持续加大对柬埔寨紧缺人才培养的援助力度^[8]。其次，地方政府和国内院校提供的奖学金项目不断增多。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西部地区省份地方政府成为对柬奖学金项目的重要来源，如广西设立了“广西政府东盟国家留学生奖学金”，仅“十二五”期间就总计拨款 7200 万元人民币，招收包括柬埔寨在内的 1020 名东盟国家留学生^[9]，此外依托“一带一路”倡议设立的专项奖学金项目也日渐增多，西部地区因此成为柬埔寨学生来华留学的首选地之一。在推进教育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国内院校近年来积极推进学生生源的国际化，不断扩大留学生的招生规模，在发展举措上就包括面向柬埔寨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留学生奖学金项目，如中山大学设立的“东盟本科留学生奖学金”和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设立的“东盟留学生奖学金”等。最后，2012 年至今，受孔子学院奖学金资助的柬埔寨来华留学生人数实现稳步增长，仅 2016 年就超过 40 人，在东盟国家中位居前列^[10]。受资助的柬籍留学生到中国有关高校攻读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硕士学位或参加不同期限的中文研修，他们当中许多人成长为柬埔寨本土中文教师，在柬埔寨中文教育发展和中柬文化交流互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开展人力资源培训

人力资源开发不足是造成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关键因素之一。柬埔寨“四角战略”（阶段三）提出“发展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以满足柬埔寨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教育行业应为此加强青年技术技能的培养，充分挖掘人口红利……获得外国官方发展援助合作伙伴的支持是有效途径之一”^[11]。中国对柬人力资源培训项目现已涵盖金融、管理、司法、农业、旅游、环保、外贸等诸多专业领域，主办单位以商务和教育主管部门为主，委托国内对外人才培养基地和职业院校承办，培训对象包括柬埔寨政府官员、管理人员以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以时间为序，中国商务部农业技术援助项目“中柬农业促进中心”从 2015 年起连续数年联合广西相关职业院校举办柬埔寨农业官员、农技人员培训班，培训学员共计 5000 人次；2017 年 10 月，中国—东盟成员国检察官交流培训基地承办了“柬埔寨高级检察官研修班”；中国商务部从 2018 年开始举办“柬埔寨教育数字化培训班”，帮助柬埔寨教育官员和教师提升数字化素养；2019 年 8 月，由中国商务部主办，海南省商务厅商务培训中心承办的“2019 年柬埔寨旅游发展与管理海外研修班”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开班。近年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中国对柬开展人力资源培训的形式开始从线下转为线上，“云课堂”为人力资源培训项目的延伸与扩展提供了全新的平台。例如，2021 年 11 月，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柬埔寨旅游部、中国驻柬大使馆共同举办的 2021 年柬埔寨中文导游线上培训班；2022 年 7 月，中国商务部主办、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承办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管理线上研修班等，都

是我国在疫情背景下坚持人力资源援柬培训的生动实践。

综上所述，中国各级政府、院校、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发力，借助多元措施体系，为柬埔寨改变教育发展滞后现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提供了大量力所能及的援助，这是中国参与国际教育治理、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体现，同时也为中柬两国带来了切实的利益。

二、新时代中国对柬埔寨教育援助的积极作用

(一)有力助推了柬埔寨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中国的教育援助帮助柬埔寨提升人力资源质量、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减缓贫困问题，成为推动柬埔寨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外部力量。

首先，中国对柬教育援助聚焦师资培养、职业教育、专业技能培训等数个领域，有效提升了人力资源质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仅以柬埔寨“鲁班工坊”为例，它起初提供包括数控加工、机电一体化、通信技术等6个技术工种的技能培训，又从2021年开始着手开展机械、电气两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学历教育，培养高层次技能人才。柬埔寨劳动与职业培训部大臣毅森兴曾表示，鲁班工坊“契合柬国家发展规划，相关专业设置紧密围绕柬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实用技术人才的需求，能有力推动柬经济社会发展”^[12]。其次，对柬教育援助有着较为明确的人力资源开发目标，既要满足“一带一路”建设人才之急需，又能契合柬埔寨“四角战略”和《2015—2025年工业发展计划》的发展要求，这不仅从根本上推动了中柬发展政策的相互融通，也使教育真正成为柬埔寨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和动力源。正是在人力资本的作用加持下，柬埔寨2012—2019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7.7%，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为实现既定的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保障。最后，对柬教育援助也是中国帮助柬埔寨减缓贫困问题的重要一环。它为柬埔寨贫困人群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帮助他们解决教育权利和发展能力缺失的问题，进而摆脱人文贫困^[13]，这既是个体提高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必要基础，也是降低柬埔寨经济贫困率的重要保障。柬埔寨的绝对贫困率已由1993年的39%稳步下降到2014年的13.5%，2019年又进一步降至9%^[14]，这既与柬埔寨政府减贫的坚定决心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密切相关，也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教育援助的积极贡献。

(二)提升柬埔寨民众对华认同，增进两国民心相通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增进民心相通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15]。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对外教育援助有助于打破心与心的隔阂，消弭人与人的距离，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手段，也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秉承“向

世界讲述中国是什么、中国何以能、中国将怎样”的责任和担当^[16]。

文化认同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中国对柬教育援助是培养生成柬埔寨民众对华文化认同深层次心理积淀的重要途径。以柬埔寨孔子学院为例，一方面组织开展的各种人文交流活动是弘扬中华文化的“推进器”，另一方面皇家科学院孔子学院促成江西省与柬埔寨暹粒省缔结为友好省份，又成为实现更高层次、更加深厚文化认同的“加速器”。与此同时，留学中国不但使大量来华奖学金留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也让他们成为促进中柬民心相通的重要使者。有国外学者通过访谈发现，绝大多数柬埔寨留学生来华前后对华态度发生了积极转变，来华之前由于对华认知有限或受媒体舆论误导而对赴华留学“感到忐忑”，但留学中国之后却认识到“中国政府的一心为民、英明领导和坚定的反腐决心；中国的社会治理能力很强；中国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中国制造的高品质以及中国人民的友好”，因而认为中国是柬埔寨学习的榜样^[17]。他们不仅自身“知华、友华、爱华”，回到柬埔寨后还成为第一线的中国故事讲述者与中国形象宣传员。

(三) 弘扬中华语言文化，推动华文教育在柬埔寨的发展

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离不开无数海内外中华儿女对中华语言文化的弘扬。柬埔寨是海外华人华侨主要分布国家之一，目前有华人华侨 80 余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6%，这一比例在东南亚国家中仅次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18]。成立于 1990 年 12 月的柬华理事总会以“发展华文教育，弘扬中华文化”为初心，领导和团结所有华人社团，推动柬埔寨发展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从幼儿园到大学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19]。中国作为中华语言文化的母国，始终与柬华理事总会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协作，多措并举推动柬埔寨华文教育固本夯基，为其强化语言文化传承功能积蓄动能。

随着柬埔寨华文教育进入发展黄金期，其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其一，致力于团结所有在柬华人华侨，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统一大业凝聚了更多共识和更大力量；其二，激扬中华文化自信，在更大程度上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其三，在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基础上，促进了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了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其四，推动传统华文教育逐步向“中文+”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强有力的人才支撑^[20]。2020 年 12 月，新一届柬华理事总会会长在建会 30 周年纪念会上表示“将鼓励华校开展热爱祖籍教育，让华裔后代传承祖籍文化，并坚定支持祖籍国和平统一大业，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力量”

^[21]。

(四) 培养各级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依托“一带一路”建设，中柬两国经贸往来持续扩大，中国连续多年成为柬埔寨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和贸易合作伙伴，2013—2019年间的对柬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速分别达到21.13%和16.5%，均保持较快增长趋势^[22]。在柬中资企业数量迅速增加，如2016年柬埔寨就跻身中国设立境外企业数量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在东盟国家中排名第六^[23]。

调查显示，人才发展瓶颈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中资企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尤其是高素质的技能型和管理型人才匮乏^[24]。在柬中资企业由于当地员工技能不足，经营效率往往难以保证，因而希望能用中国员工进行替代。然而，由于柬埔寨《劳动法》要求外国企业优先雇佣柬埔寨人，而且外籍员工一般不能超过柬籍员工总数的10%，这就使得企业在追求经营效率与现行劳工法律制度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加强当地员工的职业技术技能培养因此而成为有效的解决之道^[25]。中国通过帮扶柬埔寨职业教育发展、开展人力资源培训以及推动“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等多元化路径，为柬埔寨人力资源开发提供“精准援助”，不仅契合柬埔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需求，也确保“一带一路”背景下在柬中资企业发展行稳致远。

三、新时代中国对柬埔寨教育援助的推进策略

（一）完善顶层设计

推进中国对柬教育援助的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完善的顶层设计加以保障和指导。第一，尽早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教育援助法律，明确援助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实施细则，着力通过加快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解决对柬教育援助的机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26]。第二，完善对外教育援助机构的职能。我国于2017年成立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下设国际合作司专门“负责对外援助国际交流、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对外援助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方面工作”，但在对外教育援助领域，商务部、教育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等部门多头实施、各自为战的“碎片化”瓶颈并未得到根本性破除，因此需要增强国际合作司的统筹协调功能，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平台，充分发挥“协同发动机”的战略抓手作用。第三，完善中柬两国间的沟通交流机制。中国政府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实施对柬教育援助，然而在实践中不应忽视政策冲突、制度差异、利益博弈、语言障碍、权责模糊等不利因素，必须建立起常态化的双边沟通交流机制，2017年，《中国—东盟职教合作联盟贵阳共识》强调“组织联盟内成员单位交流和互访活动，以促进交流、沟通与合作洽谈”，能够为此提供有益参考和实践样板。

（二）转变援助模式

通过分析可知，当前中国对柬教育援助仍以项目援助模式为主导。由于资源专用以及管

理和监督机制相对简单，该模式具有投入小、见效快的显著优势，却也存在着可持续性和有效性不佳的弊端，不利于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的实质性提升。

柬埔寨历经多年的变革图治，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基本稳定，政府治理能力不断增强，接受国际援助时的自主化诉求也日渐强烈，因此仍以项目援助模式开展对柬教育援助已不能满足多元需求，部门援助模式和计划援助模式理应成为转型方向。部门援助模式是指中国为某个教育部门集中提供援助资金，柬埔寨教育管理部门可自行或商讨决定资金的具体用途并承担相应责任，中柬双方共同对援助过程和成效进行监督和评价，如此有助于保证柬方获得更大的主导权和自主权，并有效减少援助碎片化问题。计划援助模式是将援助作为输入性资源纳入柬埔寨教育的长期发展规划中，强调在制度结构层面对教育援柬进行整体调整，着重通过政策变革、制度建设、教育规划等举措，帮助柬埔寨解决教育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并致力于实现教育援助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扩大援助范围

客观而言，当前中国对柬教育援助发展水平与两国间的政经关系并不匹配，一则援助的总体规模依然有限，再则援助的范围也仅限于少数几个领域，还未能真正形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中国教育部 2016 年 7 月印发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明确指出要“做大教育援助格局，实现教育共同发展”，就柬埔寨而言，中国需要不断扩大对柬教育援助的覆盖范围，造福更广大的柬埔寨人民。第一，根据柬埔寨的实际需求，逐步实现对学校正规教育各层次的援助全覆盖。比如，柬埔寨学前教育发展滞后，较为依赖国际援助，中国可参与实施幼师培训、教材开发和基建改造等援助项目，同时，针对柬埔寨高等教育不发达的现状，中国高校可适时开展中柬校际合作，或者在柬埔寨设立分校。第二，扩大非正规教育领域的援助范围。柬埔寨于 2002 年颁布了《国家非正规教育政策》，提出发展短期增收培训、软技能与企业管理培训等多种教育项目，中国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建立起包括政府、院校、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对柬非正规教育援助体系。第三，在教育援助发展规划上扩大对弱势群体的覆盖面。由于社会经济的不发达以及教育制度的不完善，柬埔寨的教育弱势问题较为突出，乡村孩童、残疾儿童、薄弱学校学生等弱势人群在教育资源上并未获得有效倾斜。对此，中国政府可以协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机构，以及鼓励国内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不断拓展该领域的援助广度和深度，从而帮助柬埔寨推进教育公平建设。

（四）填补发展“洼地”

为了构建均衡发展的援助体系，中国对柬教育援助应当填补发展“洼地”。第一，持续补齐本土师资培养的短板。师资是教育的生命线，但目前中国开展的柬埔寨本土师资培养存

在两个明显不足，一是覆盖面窄，仅限于中文教育等极少数领域；二是培养方式上仍以短期速成培训为主，培养质量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对此，一方面应以“丝绸之路”师资培训计划为发展契机，不断扩大柬埔寨本土师资培养的覆盖领域，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柬埔寨本土师资培养学历化，切实保障培养成效。第二，大力加强与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在对柬教育援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积累了丰富经验，加强与它们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可以为中国对柬教育援助提供有益借鉴，也能够更好地让中国融入国际教育援助体系当中，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和国际声誉。第三，重视发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中国非政府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对柬教育援助，是从民间层面对政府发展援助的有益补充，也是公共外交力量的积极作为。从作用来看，中国非政府组织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援助活动，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中柬民心相通，也将对柬埔寨的政府教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本文来源：广西社会科学. 2022(09)**）

参考文献：

- [1] Aid and development [E B/OL]. (2018-08-30) [2022-04-30]. <https://opendevelopmentcambodia.net/topics/aid-and-development/>.
- [2] Country at a Glance - Cambodia [EB/OL]. (2020-02-20) [2022-05-10].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education/country/cambodia>.
- [3] 国务院侨办及中使馆资助柬埔寨华文教育发展 [EB/OL]. (2014-04-18) [2022-04-18]. <http://www.hwjyw.com/info/content/2014/04/18/30332.shtml>.
- [4] 黄书.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孔子学院及其作用与意义 [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2）：13-16.
- [5] 首届柬本土中文教师与人才培养研讨会在金边举行 [EB/OL]. (2020-10-23) [2022-04-23]. http://kh.china-embassy.org/dssghd/202010/t20201023_1400501.htm.
- [6]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发起设立“中国—柬埔寨职业教育合作联盟” [EB/OL]. (2019-07-23) [2022-04-23]. http://fao.wenzhou.gov.cn/art/2019/7/23/art_1340368_36024319.html.
- [7]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visits loyal friend Cambodia [EB/OL]. (2016-10-13) [2022-05-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cambodiaaid/USKCN12DONV>.
- [8] China offers 550 scholarships for students to study for 5 years [EB/OL]. (2021-11-17) [2022-05-17]. <https://www.khmertimeskh.com/50972089/china-offers-550-scholarships-for-students-to-study-for-5-years/>.
- [9] 广西今年奖励 164 名东盟留学生 [EB/OL]. (2016-03-31) [2022-05-18].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603/t20160331_236054.html.
- [10] 周月, 罗安迪. 中柬教育合作的现状与挑战 [J]. 南亚东南亚研究, 2020（4）：77-93+155-156.
- [11] SAMDECH DECHO HUN SEN. "Rectangular Strategy" for Growth, Employment, Equity and Efficiency Phase III [R]. Phnom Penh: Royal Government of Cambodia, 2013: 4-6.
- [12] 赵益普. 鲁班工坊为澜湄职教合作“添砖加瓦” [N]. 人民日报, 2021-04-06（03）.
- [13] 徐贵恒. 人文贫困的提出及其内涵 [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94-97.

- [14] Poverty policy and regulation [EB/OL]. (2021-11-02) [2022-05-12]. <https://opendevelopmentcambodia.net/topics/poverty-policy-and-regulation/>.
- [15] 习近平. 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60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 [N]. 2014-05-16 (02).
- [16] 苏珊珊. 冷战后“中国威胁论”的历史演变 [J]. 社会主义研究, 2019 (2): 140-147.
- [17] CHHOEUNK. Australian and Chinese Scholarships to Cambodia: A Comparative Study [D].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9.
- [18] 李太生, 李莹. 走进东盟 [M]. 北京: 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2020: 107.
- [19] 刘晗, 吴坚. 从无到有: 柬埔寨华文高等教育发展新动向 [J]. 世界教育信息, 2020 (10): 43-48.
- [20] 朱虹, 郝瑜鑫. 新任务新使命: 新中国 70 年的华文教育事业 [EB/OL]. (2020-01-02) [2022-05-02]. http://news.cssn.cn/zx/bwyc/202001/t20200102_5069561.shtml.
- [21] 欧阳开宇. 方侨生发表柬华理事总会成立 30 周年献词 [EB/OL]. (2020-12-26) [2022-05-10]. http://k.sina.com.cn/article_1784473157_6a5ce64502002379r.html.
- [22]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柬埔寨 [EB/OL]. (2022-01-19) [2022-05-20]. <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jianpuzhai.pdf>.
- [23] 2016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EB/OL]. (2017-09-30) [2022-05-21]. <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jsj/tjgb/201709/201709-02653690.shtml>.
- [24] 2019 年“一带一路”沿线中国民营企业现状调查 [EB/OL]. (2020-02-07) [2022-05-12]. http://www.cbt.com.cn/zggszz/zggs11/zzdcbg/202003/t20200312_160141.html.
- [25] 陈瑛, 杨先明. 技能短缺与技能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企业海外雇工问题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66-69.
- [26] 张月琦, 马早明.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柬埔寨教育援助的策略思考 [J].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18 (5): 60-66.

◎热点分析

“一带一路”在东南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美日联盟政治的视角

包广将， 范宏伟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 南洋研究院）

“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便引起国内外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在国内已然成了一门显学。在诸多研究中，不少学者对“一带一路”在东南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此类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聚焦于东南亚国家内部问题对“一带一路”的影响。例如，政局变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族群政治、环保主义、非政府组织等东南亚内部问题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二是从国别视角研究外部特定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论及中国、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等域外国家；三是强调中国与其他大国在东南亚展开竞争对“一带一路”的影响，涵盖中日、中美、中印等诸多双边关系竞争的影响；四是从非传统安全视角探讨新冠疫情、海盗、恐怖主义、移民等问题对“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影响。整体观之，这四方面的研究为“一带一路”在东南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勾勒出了一幅全景图，但仍有许多不甚清晰的地方。例如，在既有研究中，以美国、日本为核心的联盟政治对“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往往被忽视，或是一笔带过。国外学者则主要关注“一带一路”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关注“一带一路”在东南亚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东南亚国家担心东盟“中心性”被弱化或生态环境被破坏而对“一带一路”持冷淡态度。二是“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推进会引起西方国家的介入和抗衡。究其原因，学界对联盟政治的忽视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导致：一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对联盟政治不甚重视，甚至对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国采取极限施压的方式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优先”政策。这使得许多学者对美日为核心的联盟政治对“一带一路”的影响缺乏关注。二是学界对“联盟”的理解仍然采取狭义方式，往往习惯性地将对联盟视为范围狭小的军事联盟。事实上，联盟的内涵及外延已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从军事领域扩散至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观等诸多层面。因而，本文理解的美日联盟政治是一种广义的理解，指的是美日主导的一切联盟理念和行为。

拜登执政后将重整联盟作为其主要工作方向，联盟政治已经成为美国实施“印太战略”乃至对抗中国崛起的重要方式。拜登上台以来，强化美日、美英、美韩、美澳、美菲，美日

澳、美英澳等一系列双边、三边同盟，继承并强化美日印澳“四方对话”、积极推动“四方对话”的扩大化和实体化发展，利用“五眼联盟”“G7”“北约”等传统联盟机制强化同盟关系。目前，在印太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一个涵盖双边、三边、小多边及多边的相互联动的立体性联盟体系。在这个联盟体系中，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条约盟国，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等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支点国家和重要战略伙伴国。显然，这个庞大的联盟体系通过美国的直接介入（重新修订条约、组织军事演习等）、盟国的间接影响（日本、澳大利亚对东南亚国家的拉拢）以及各种非正式合作（列席会议、军事援助等），从客观和主观上对东南亚国家的观念和行为进行着或明或暗的重塑。

目前，拜登政府主要通过如下几种措施重塑印太联盟并重塑东南亚国家：一是推动“轴辐体系”的网络化重塑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 3 个东南亚条约同盟国；二是推动“四方对话”的扩大化努力吸纳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伙伴国；三是深化同盟海洋安全合作，影响东南亚海岛国家。这些措施必然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形成对冲效应。例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出“四管齐下”的战略建议：应对“一带一路”带来的具体经济风险；提升美国的竞争力；与盟友、伙伴和多边组织加强合作；保护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安全利益。鉴于此，无论是出于对既有研究的拾遗补漏，还是着眼于美国印太联盟体系演进带来影响，联盟政治都值得关注和研究。那么，在美日等国的联盟政治作用下，“一带一路”在东南亚面临哪些新挑战？

一、美日联盟政治对“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挑战

美日主导的联盟政治通过各种形式向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对“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政治安全环境恶化、竞争格局变迁、发展路径替代及社会舆论攻势 4 个方面。

（一）美日联盟政治导致经济问题政治化，“一带一路”面临复杂化的安全环境

从地缘和空间上来说，“一带一路”倡议分为海路与陆路两条线路，是将欧亚非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相互连接的陆海一体化倡议。2017 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用“印太战略”取代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地缘上主要立足于印度洋、太平洋沿线国家，调整后的战略更聚焦于中国周边海洋地区。除了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友之外，美国或日本与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在武器销售、军事人员培训、海洋执法等安保领域加强合作。近年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一些盟友和安全伙伴，在他们与美国双边联盟框架之外，相互之间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明显在扩大和深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日本及其他西方盟友的这些举措，已将东南亚海岛国家加上越南全部覆盖，这导致“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外部安全环境复杂化。

面对中国“一带一路”在海外基础设施领域的显著进展，美国联合盟友也投入大量资源，2021年6月七国集团推出了“重建更好世界”的基建计划，以对冲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美日联盟政治的影响强化了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特定议题合作的“安全化”与“政治化”的顾虑。东南亚国家担忧域外大国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量外资使项目脱离经济合作的轨道，对本国国家安全带来隐患。譬如，在中泰和中印（尼）的高铁合作中，两国均对相应投资项目进行了严格的安全审查，并与日本方案进行系统比较。在安全领域，“区域安全关系的网络化，将使美国突破传统的以双边合作为基础的‘轴辐’体系，构建起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持久的、巨大的安全压力”。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日在军事领域会显示出更强烈的进攻态势。在军事上，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出台《印太战略报告》称，美国应“强化在印太地区由美国主导的、盟友与安全伙伴国共同参与的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在南海等热点问题上美国故意炒作，将南海的所谓“自由航行”军事挑衅行为盟友化、常态化、国际化，法国、德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因应美国均派出舰船到南海，进行各种名堂的联演联训，甚至穿越台湾海峡。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正尝试从制度上继续加大对南海声索国的影响力度，例如将“QUAD”拓展为“QUAD+”，邀请越南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在美日印太合作框架下，日本在同东南亚国家的防务合作中，有针对性地帮助越南、菲律宾和印尼军事实力弱小的国家提升实力，以增加中国“胁迫”他们的成本。在观念上，美国通过强化或夸大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忧患，大肆宣传中国的威胁，进而拓展美日在东南亚的安全与军事合作，引导东南亚国家向印太联盟体系倾斜，破坏“一带一路”倡议的安全环境。美国强化东南亚国家的民粹主义和反对派的反华声浪，对“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推进带来变数。一旦美日主导、妖魔化的这种威胁和认知在东南亚国家中不断发酵和培育，与当地的政党政治、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融合在一起，尤其是伴随着东南亚国家的政局更替或动荡，“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一区域的政治和安全环境就有可能出现至少是阶段性的恶化。同时，联盟政治意味着美国强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安全保障和承诺，影响东南亚国家的决策倾向。例如，美国2018年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强调，“在印太地区保持有效的力量平衡是美国国防的目标之一，并特别强调将建设一支更具杀伤力的部队、巩固联盟和吸纳新的伙伴国、改革国防部等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二）美日深化印太联盟，“一带一路”面临“一对多”的竞争格局

美日联盟政治将促使中国在东南亚与他在各领域的竞争格局从“一对一”到“多对一”的变迁。竞争格局的变迁一方面体现在数量的变化上，即中国同时与多个协同一致的联盟国

家展开竞争。另一方面体现在竞争领域的变化，即中国在多个领域面临联盟竞争。美日联盟政治的实质和内容已经远远超出军事安全合作的传统范畴，而是向多种新兴领域不断扩展。2021年4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在新时代的联盟关系中，增强在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和民用空间领域的研究与技术开发方面的合作，共同提高两国的竞争力，在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敏感供应链上进行合作。9月24日，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再次声称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半导体供应链安全方面加强合作，打造半导体等关键技术和材料供应链。可见，在愈发“内卷”的国际社会中，联盟政治向多个领域扩展已成为大国竞争的一个重要趋势。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等领域，美日正在强化联盟战略，深化美日同盟，强调盟国、伙伴国之间的配合与互动，“以多对一”的方式在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各领域展开竞争。

美国联合日本、澳大利亚等主要印太盟国影响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态度，夸大“一带一路”在该地区的政治与战略后果，甚至在疫情期间尝试建立没有中国参与的产业链网络。2017年召开的美日印澳“四国对话”首脑会议中称，“美日两国将遵循公平与平等的伙伴关系并通过公私合作，支持‘第三国’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2021年2月24日，拜登总统专门就美国的供应链问题发布行政令，表示要与盟友和与美国有共同价值观的伙伴在供应链上进行密切地合作，确保集体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3月白宫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4月的美日首脑联合声明、9月的QUAD首脑会谈联合声明都反复确认了这一点。可见，美国通过联盟政治应对“一带一路”的趋势正逐步强化。

东南亚国家是西方国家实施联盟政治的主要对象。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加上美日在政治上的盟友关系，美日能够很顺利地在东南亚地区建立盟友关系，以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影响与挑战。近年来，美日利用各自的优势，显著加强了在东南亚地区的磋商与合作。2019年，美日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对联盟能力的现代化升级改造，以便满足目前和未来印太地区形势发展的需求。美日两国都有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加上日本早先推行的“绿色联通”战略为东南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为东南亚能源、生态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贡献。为了削弱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美日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还不断在湄公河地区推进，而湄公河是中国影响力较强的地区，两国的政治经济目的不言而喻。近年来，美国与日本建立了多个双边、多边合作机制来应对“一带一路”，实施印太战略。2017年，美国与日本建立了战略能源伙伴关系，东南亚是双方合作的重点区域之一。2018年7月，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建立了“印太”基础设施三边投资伙伴关系。2019年8月，美国与日本在湄公河下游地区建立了日美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发展该区域的电力基础设施，加强

地区能源安全。如果中国不对这些挑战做出积极有力地回应，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可能顺利推行，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将会大打折扣，从而遭受美国的围堵。除此之外，印度的“东进战略”，韩国“新南方政策”等也在对接美日“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的经济建设项目展开竞争。美方筹谋从经济、外交、安全、舆论等方面加大对“一带一路”的制衡，尤为重视应对“数字丝绸之路”“标准输出”“军民两用基础设施”等问题。“印太战略”是美国反制和对冲“一带一路”的主要抓手，东南亚则是实施这一目标的重要地缘方向。

（三）美日出于自身利益为东南亚寻求“替代方案”，“一带一路”面临路径对冲

美日等国加大在公共卫生、数字经济、网络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等新兴领域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积极为他们寻求替代方案，通过抢占或深化在新兴领域的合作挤占“一带一路”的合作空间，使“一带一路”面临路径对冲与替代的挑战。2017年10月18日，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投资、融资计划，诸多印太国家缺乏选择余地，并渲染“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2019年11月，由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牵头，日本（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和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在泰国召开的第35届东盟峰会上共同发起“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计划，宣称打造一种“多元利益攸关者”倡议，在“公开、包容”框架下提升全球基础设施发展的“高质量、可信任”标准。拜登政府延续并强化了这一计划，并利用七国集团峰会宣布了一项协助中低收入国家兴建基础设施的计划——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美国宣称，重建更美好的世界是一个能满足中低收入国家巨大基础设施需求的积极倡议，拜登总统和七国集团合作伙伴一致发起的是一个全新的全球基础设施倡议，它是一个由主要民主国家领导的价值观引导、高标准和透明的基础设施合作平台，以帮助缩小发展中国家在COVID-19大流行后超过40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需求缺口。通过该项计划，G7和其他合作伙伴将在4个重点领域（气候、卫生和卫生安全、数字技术以及性别平等与公平等）协调动员私营部门资本，并利用他们各自的金融机构激励投资。B3W将在未来几年为中低收入国家带来数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价值观引导、良好的治理和严格的标准、环境友好、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调动私人资本以及强化多边公共财政的影响是其主要特征。这项计划旨在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被认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首次提出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新加坡学者评论到，尽管“一带一路”在不断更新，但它主要侧重于传统的“硬”基础设施：港口、道路、水坝、铁路、电厂和电信设施。B3W则将专注于“更软”的基础设施，即气候、卫生和卫生安全、

数字技术以及性别公平和平等。G7 领导人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向世界展示，除了中国以外，富裕的民主西方国家也可以提供“另一种选择”。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说，“‘重建更好世界’计划的积极之处在于，这是美国首次真正提出了应对‘一带一路’的措施”。

（四）美日联合发起舆论攻势，“一带一路”面临信任危机

在价值观领域，一方面，美日等西方国家以所谓的“科学政治”引领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基础设施、气候政治、清洁网络等不断联合提出新型发展理念，并将这些理念与“民主”“自由”等政治价值观融合，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展开一场“未来潮流”之争。拜登说：“制定‘重建更好世界’伙伴关系的努力旨在动员全世界民主国家，以迎接世界面临的挑战，并帮助我们的人民，更确切说，是帮助各地的人民。”美国提出自己的印太经济构想，日本则提出契合其“绿色联通战略”的“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倡议冲击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日本历史上在东南亚地区实施的“绿色联通”战略颇有影响力。日本绿色产业链的延伸也正带动更多的日本企业及业务扩展到东南亚，促进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绿色形象“价值体系”的认同。日本基于本国实力，打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旗帜，与其“绿色联动”战略形成呼应，在东南亚国家中有良好的声誉。与之相配合的有东南亚地区的国际组织以“保护环境”乃至“维护主权”为由抵制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目前，世界银行集团和日本政府建立了高质基础设施投资（Qualit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QII）伙伴关系，目的是提高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在质量方面的认识 and 关注度。其中包括最大限度地发挥基础设施的积极影响、根据生命周期成本提高经济效率、整合环境和社会因素、建立应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以及加强基础设施的治理。“高质量”理念已被 G7、G20 等国际组织和许多东南亚国家认可，对“一带一路”具有一定的对冲性。

另一方面美日不断抹黑或矮化“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舆论攻势。美国一直在带头妖魔化、破坏和阻碍中国的“一带一路”行动，体现在各种所谓的“中国新帝国主义”“掠夺性经济活动”“国家驱动投资模式”“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债务帝国主义”等标签上。例如，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潜在结果带来的“新殖民主义”论认为，“一带一路”通过增加国债负担并使那些不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中国商品的出口市场，强化中国在亚洲和非洲的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从而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范围。萨克斯声称：“所有建设项目的工人都是中国自己带来的，他们不把技能传授给当地公司和当地工人。有些甚至不能提供通常以商业利率提供的贷款。此外，‘一带一路’项目还出现了很多腐败丑闻。”指责“一带一路”转移污染行业、破坏项目所在地环境。美国常以

“债务陷阱”“掠夺性经济活动”“国家驱动投资模式”乃至“新疆民主主义”等标签抹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来，不少美国研究智库及媒体以南海生态环境安全为借口，大肆宣扬“环境破坏论”“渔业资源枯竭论”等，对中国的形象进行抹黑。美国《印太战略报告》认为“一带一路”会对东道国带来沉重的经济成本和负面作用，更指责中国一边利用国际秩序获取利益，一边又侵蚀着以规则为基础的价值观和规则。一份非洲报告指出，一些非洲政府的债务水平令人严重关切，例如安哥拉（250 亿美元）、埃塞俄比亚（135 亿美元）、赞比亚（74 亿美元）、刚果共和国（73 亿美元）及苏丹（64 亿美元）等非洲大陆最大的债务国。最近，一些西方领导人公开批评“一带一路”和中国，例如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妄称中国是“一个不遵守多边规则并与民主国家有着不同世界观的国家”，并保证将仔细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然而，“债务陷阱”等标签是由西方国家联合策划的，本质上是一场针对“一带一路”的联合舆论攻势。

信任是国际合作的基础，本身是推进“一带一路”的一种“基础设施”，美日对中国的舆论攻势引发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怀疑和警惕。与此同时，美日却努力加强印太地区的基建来“赢得地区国家的信任”，并抗衡中国的影响力。美国在人权、环保、就业等领域对中国进行造谣抹黑，影响了东南亚大众阶层对中国的正确认知，形成“从下而上”影响“一带一路”项目的传导机制。例如，尽管中国在老挝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堪称典范，老挝政府也肯定该倡议在老挝所做的巨大贡献，但是在老挝民众和私人部门依然存在将中国的活动描绘成“一个新帝国或新殖民主义行为”，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开采老挝的自然资源，单方面促进中国自身利益并破坏老挝文化。这对激化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对华的仇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或延长“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地周期；美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水安全威胁”“经济胁迫”等安全议题，影响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精英阶层之间的战略互信。由于美国在国际舆论引导上占据优势，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形象的矮化在东南亚精英阶层已经形成一定的市场。“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过程中时常会受到西方文化霸权对东南亚国家舆论环境的负面影响。美日许多极具舆论攻势的媒体报道或智库报告诱使东南亚精英提高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提防心态。

概而言之，美日联盟政治对“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影响主要通过 4 种路径实现：一是将“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合作项目进行政治化炒作，引发东南亚国家民众或反对党的厌华情绪，进而阻止项目的正常推进；二是联合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美国主要盟国，针对中国在东南亚的合作共同策划、共同推进、共同施压，努力在东南亚排挤和遏制中国；三是从合作项目入手，针对“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提出新的合作方案、新的合作路径以替代

“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四是从“一带一路”带来的后果切入，夸大“一带一路”对东南亚国家的负面影响，炒作“债务陷阱”“环境危机”“过度依赖”等，减损我国在东南亚的战略信誉。

二、美日联盟政治与“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发展前景

尽管美日联盟政治对“一带一路”构成了许多挑战，但是美日联盟毕竟只是一个“第三方”影响变量，左右不了“一带一路”的全部走向。作为一个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开放性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发展前景与其不断自我迭代革新的发展进程和东南亚国家的接纳度密切相关。

（一）“一带一路”倡议自我革新的发展导向

自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已经经历了多次迭代升级。近年来，在面对美日不断提出新兴发展理念的冲击下，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以促进“一带一路”各合作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致开幕辞时指出，“要建立政策协调对接机制，相互学习借鉴，并在这一基础上共同制定合作方案，将有关规划协调起来，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在2018年“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截至2020年3月，共有138个国家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指出，“要稳妥开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培育合作新增长点。”这表明“一带一路”不断自我革新、不断适应时代需求的发展导向非常坚定。

事实上，美日等西方国家之所以通过联盟政治以“多对一”的方式与“一带一路”展开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取得了重大进展，进而引起美日等国的反弹性应对，乃至恶意攻击。中国官方更将“一带一路”视为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低碳、循环发展是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2017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的《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与《“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把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列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内容。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发展绿色“一带一路”是实现从工业文明逐步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助推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观要求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景。“一带一路”在概念内涵上也在不断延伸，正在从高大上的“硬”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转向更多“小而美”的民生项目。绿色、透明、健康、廉洁、可持续发展等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理念。中国自身真正将“一带一路”在各地区、各领域的合作

项目按照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是获得国际社会信任的第一步，也是对美日联盟政治最有力的回应。目前，“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已被纳入联合国、G20、APEC、上合组织等区域性或全球性国际组织，并在实践中为沿线国家增加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报告也高度赞扬“一带一路”为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落后贫穷地区创造了就业机会。在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合作中，经济合作区、创业园区、大型合作项目、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东盟东部增长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已经显现出巨大成效。有学者指出，“由于地缘优势和长期积累下来的战略资本，中国仍将掌握与东盟合作的主动权。保持战略定力，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复合型的手段发展东盟关系，扩大中国在东南亚的优势地位是大势所趋。”新加坡学者总结到，尽管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持续性存在一些猜疑，但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在逐步迈入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绿色丝绸之路）、医疗援助与合作（健康丝绸之路）以及电信和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丝绸之路）等新兴的优先领域。在“一带一路”倡议未来的发展中，只要能不断提量提质，惠国惠民，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有机结合，必将越来越受到东南亚国家的认同和接受。

（二）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走向

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是应对美日联盟政治影响和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关键变量。东南亚国家接受“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原因在于它在国家层面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在区域层面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设相契合。“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以发展战略对接为基础的经济合作是双方一步一步前进的过程。张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分析了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接纳度，他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与东盟的对外贸易存在明显的共向发展和共生发展效应。从客观指标看，东盟对外贸易总额从2013年的25331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8253亿美元，增长了11.5%，年均增长接近2%。同期，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从2013年的3516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4838亿美元，增长了36.6%，年均增长6%以上。从主观上看，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态度存在积极变化，整体上从谨慎态度向主动接纳，从地缘政治猜疑向对高质量发展的观望和期待转变。查雯的研究指出，“菲律宾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之下的确一改往常的若干外交安全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美国和菲律宾的安全合作关系，为中菲关系改善提供了机遇。”虽然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是处在经济发展向工业化转型的关键阶段，仍然渴求外资的大量进入。老挝、柬埔寨、缅甸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更需要利用外资促进本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中国-东盟“一带一路”以东盟国家发展实际为基础，寻求与东盟国家的发展规划建立

各种形式的“战略对接”。在东盟层面，东盟出台的《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愿景与“一带一路”的核心合作领域即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这为双方经济发展战略的对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国家层面，泰国的“东部经济走廊”，越南的“两廊一圈”，老挝的“陆锁国变陆联国”，印尼的“世界海洋轴心”，柬埔寨的“四角”战略以及马来西亚的“全面发达国家—2020”等国家战略或项目与“一带一路”存在较高的契合度。即使在新冠疫情的肆虐下，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依然取得巨大进步。2020年中国与东盟的总贸易额为6846亿美元，同比增长6.7%。经贸领域的逆势增长有效回击了有关“一带一路”的“新殖民主义”论调。相对于对中国实施联盟政治的G7国家，中国在物质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的整体基础设施开发和项目管理技能（包括成本控制）优越于G7国家，建筑工人和材料也更加便宜。显然，对于仍处于发展相对落后的东南亚国家来说，传统的“硬”基础设施更符合东南亚国情，新兴的“软”基础设施也必须以“硬”基础设施为依托。“一带一路”与许多东盟国家在政策、合作领域、合作目标及合作方式等方面都具有融合性，在经济上能促进东盟的可持续发展，在政治上能提升东盟作为印太地区重要力量的“中心性”。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对美国、日本等国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强化中美战略竞争也出现深深的质疑。当今，东南亚国家战略的重点是发展经济而不是应付战争，美国要复苏冷战时期以同盟体系为支撑的地区安全秩序已无理论和现实基础。在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保证发展经济的优先性方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具有极强的战略共识，这为“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信任基础。

（三）“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的发展趋向

“一带一路”自我革新的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需求的对接，美日联盟政治的发展态势决定了“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地区的未来走向。

首先，“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从投资拉动到需求拉动的发展。“一带一路”一度被认为是中国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发展逻辑使然，这加深了东南亚对该倡议的疑虑。对此，“一带一路”以东南亚国家的需求为切入点，根据“一国一策”的原则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合作方案。对于发展比较落后，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国家而言，其对传统基础设施、园区建设、能源合作等方面存在较为迫切的发展需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到2030年，仅亚洲就面临着26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主要集中在电力和交通领域。基础设施融资缺口仍然较大，这为“一带一路”提供了空间。这些传统基础设施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可作为“一带一路”合作模式与空间突破的重点。对于工业化阶段较为成熟的国家，其对环保、5G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发展具有渴望和需求。调整“以投资为导向”向

“以需求为导向”的发展策略，更好回应周边国家的其他诉求。在面向东盟国家的优先需求培育基建合作的新增长点，切实为“一带一路”设施的互通注入提质升级的动力的同时，又要密切关注域外大国的竞争动向以及东盟地区政治经济的变化趋势，对基建合作中存在的确定性和“安全化”风险等做好防范预案；从经济发展的单一驱动向涵盖经济、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的综合驱动是东南亚国家的普遍需求。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优先考虑的领域之一，中南半岛国家担心基础设施建设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这种担心在现实中的体现就是对中国投资项目的搁置，如莱比塘铜矿、密松水电站等的搁置。目前，中国一些企业对社会责任、环保意识仍有待改善。“一带一路”不仅局限于经济合作方面，还应拓展至社会、文化、生态、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性合作。在这方面，2021年6月，在“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期间，中国同与会各国共同发起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各国能源结构的调整，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能源合作、绿色金融合作等方面的需求都会出现上升态势。

其次，“一带一路”在安全领域具有巨大合作空间。安全合作既是夯实“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合作基础的要求，也是应对美日联盟政治的需要。经济与政治“两张皮”的现象一直是困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重大问题，“一带一路”的推进有望促进政经两个领域的融通。发展至今，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最大的担忧和质疑源于安全领域而非经济领域，或者由经济引发的安全担忧，例如“经济胁迫”“过度相互依赖”等。而且，美日联盟政治对“一带一路”带来的压力首先体现在政治安全领域。尽管中国的竞争优势依然在经济领域，但如果安全问题处理不好，安全合作始终停留在较低层次，那么一方面美日联盟政治引发的政治安全议题容易破坏“一带一路”在东南亚推进的安全环境，更容易将经济合作问题政治化。另一方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合作中难以向深度推进，政治安全的短板必将通过信任水平的低下而影响经济合作。中国与东盟应寻求在安全领域的突破和发展，事实上，双方在安全领域具有巨大合作空间。针对传统热点安全问题，双方应补齐短板，防范安全环境恶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程，尽早落地生效，使之成为抑制安全风险的有效机制，通过制度保障提升双方的战略互信。针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双方应拓展合作空间，降低东盟国家以安全对冲经济的路径依赖。东南亚国家一直以来在与中国展开经贸合作的同时依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寻求安全保护并对冲中国的影响力。对此，积极探索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举行军事演习和海洋安全合作的可行路径，在安全领域为东南亚国家寻求不同于美日等国的“替代方案”。孙学峰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2018年历史性地开展了第一次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中

国与东盟国家安全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带动了中国战略信誉的相对上升，为持续改善周边安全环境奠定了基础。东南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发展区域，但该区域的安全环境并不理想，需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共同合作。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可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例如防治灾害、海上安全等开展广泛合作。

最后，强化第三方市场和合作是“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化解美日联盟政治的重要方向。加大与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力度，构建范围更加广阔、性质更加开放的全球合作体系应对美日等国的联盟政治。2018年中日两国举办了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后，同意共同推动“第三方”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在此基础上，中国应在一些领域努力与美国、日本、印度、韩国等印太系国家和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欧洲系国家的合作，协调在东南亚的合作。这既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合作需求，也是降低合作风险和化解美日等国联盟政治的有效途径。尽管美日主导的印太联盟体系旨在遏制中国崛起，但是正如蒂莫西·多伊尔（Timothy Doyle）所言，历史上类似的崛起是无法遏制的，中美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五十年印太地区的战争与和平。既要看到美日等国的联盟倾向，也要看到美日等国之间的分歧。例如，美日虽然在东南亚能源基建领域合作，以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但双方都有各自的经济诉求，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十分微妙，也将影响到美日之间的合作。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对外部区域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日本迅速提升了对供应链安全的防范意识。构建一个基于规则的长期和平稳定的区域环境对日本供应链安全尤为重要，而美国的首要目的是防范中国，甚至不惜破坏区域稳定的风险以达到遏制的目的。同时，东南亚国家也乐于看到B3W和BRI在相互竞争中不断提高合作质量。尽管美国主导的B3W往往被视为“一带一路”的竞争对手，但是它与BRI依然存在融合和补充的空间，这可以共同为建设东南亚“高标准”“高质量”基础设施做出重大贡献，促进东南亚在后COVID-19时代的经济增长。

在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背景下，针对西方联盟政治对相关合作项目的政治化操作以及东南亚地区不太稳定的政治环境，我国应做好政治风险评估和相应风险应对机制；针对西方联盟政治推动“一对一”向“多对一”竞争格局的转型，我国应加大“第三方”参与“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力度，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破解西方的联盟围堵；针对西方联合提出的新方案、新路径、新理念，我国应加快“一带一路”的迭代升级和自我革新，切实推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以高质量吸引东南亚国家的积极参与；针对四方联盟政治对“一带一路”发起的舆论攻势，我国应加大公共外交和传播能力建设，以东南亚国家能更好接受的方式讲好“一带一路”。

三、结论

尽管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东盟和欧洲在印太地区都有自己的议程和利益，但在应对中国方面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在美国和日本的推动下，这些力量正向印太地区聚拢，很可能在军事、安全、技术、供应链、治理和经济发展援助等传统和新兴领域形成合作联盟，最终形成层次多样的联盟体系。鉴于日本与美国历史上形成的牢固联盟关系，与印度、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广泛而稳定的伙伴关系以及在管理对华关系方面的长期经验，日本有望在这一联盟合作体系中发挥仅次于美国的主导作用。可见，美日主导的联盟政治是中国长期面对的现实。这不可避免地对“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自我革新和迭代发展本身是对美日联盟政治最为有力的回击，而且“一带一路”与东盟国家许多发展战略存在较高的契合度，这也引起东盟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逐步趋向正面。面对美日联盟政治带来的挑战，安全合作、需求拉动、多领域开放性综合性发展等将是“一带一路”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同时，“一带一路”项目推进需要适时、合理地调整对东南亚的相关政策，争取维持中国与东南亚的睦邻友好关系。（**本文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4(01)**）